

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史研究文库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一五”规划2006年度一般项目成果

西南民族大学优秀学术专著出版专项经费资助

四川古代民族史

SICHUAN GUDAI MINZUSHI

李宗放◎著 民族出版社



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史研究文库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一五”规划2006年度一般项目成果

西南民族大学优秀学术专著出版专项经费资助



四川古代民族史

SICHUAN GUDAI MINZUSHI

李宗放 ©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四川古代民族史 / 李宗放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0

(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史研究文库)

ISBN 978 - 7 - 105 - 10924 - 1

I. ①四… II. ①李… III. ①古代民族—民族历史—研究—
四川省 IV. ①K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17351 号

策划编辑: 虞农 覃代伦

责任编辑: 郎洁 康厚桥

封面设计: 孟龙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网 址: <http://www.mzcs.com>

印 刷: 北京彩云龙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北京 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数: 1000 千字

印 张: 43

定 价: 188.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10924 - 1/K · 1921 (汉 1049)

该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编辑室电话: 010 - 64271909 发行部电话: 010 - 64224782

目 录

第一章 旧石器、新石器时代四川的原始居民	1
第一节 四川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和原始居民	1
第二节 四川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和原始居民	3
第二章 蜀国	14
第一节 文献记载中的蜀国	14
第二节 灿烂的三星堆文化	19
第三节 金沙光辉	24
第四节 蜀国的社会、经济、文化	29
第五节 蜀国的灭亡、蜀人的迁徙和秦在蜀地的统治	41
第六节 先秦时期蜀地的民族	46
第三章 巴国的兴亡	50
第一节 巴国的发展及其西移、北移和灭亡	50
第二节 巴国的社会、经济、文化	54
第三节 秦在巴地的统治	57
第四节 巴地的民族	58
第四章 西汉时巴蜀等郡的民族	63
第一节 西汉在巴蜀、邛、笮、冉駹等地的设置和统治	63
第二节 蜀人称谓的消失	68
第三节 巴人的发展	69
第四节 巴蜀等郡的其他民族	71

第五章 东汉时巴蜀等郡的民族	81
第一节 东汉在巴蜀等地的设置和治理	81
第二节 巴人、賨人的发展、反抗和迁徙	85
第三节 广汉、蜀、犍为、越巂郡以及巴郡的民族	87
第六章 三国时蜀汉政权统治下巴蜀等郡的民族	94
第一节 蜀汉政权在巴蜀等民族地区的设置和治理	94
第二节 蜀汉益州巴蜀等郡境内的民族	101
第七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益、梁等州民族	109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各王朝在益、梁等州民族地区的治理和设置	109
第二节 成汉政权的兴亡	120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益、梁等州民族的变化情况	126
第八章 隋唐时期的益州总管府、剑南等道的民族	142
第一节 隋在益州总管府民族地区的设置和治理	142
第二节 唐在剑南等道民族地区的政治、军事设置和治理	144
第三节 吐蕃在剑南道的扩张及影响	155
第四节 南诏的北进及影响	164
第五节 隋唐时期益州总管府、剑南等道的民族及其部落的变化	171
第九章 五代宋大理时期四川境内的民族	197
第一节 前蜀、后唐、后蜀、宋、大理政权在四川民族地区的设置和治理	197
第二节 五代宋大理时期四川境内诸族	205
第十章 元代四川境内的民族	239
第一节 蒙古人入川和元朝在四川境内民族地区的设置和治理	239
第二节 元朝时期四川境内的民族	250
第十一章 明代四川境内的民族	268
第一节 明在四川民族地区的治理和设置	268
第二节 明代四川的土官	280
第三节 明代四川境内的各族	346

第十二章 清代四川的民族	392
第一节 清在四川民族地区的治理和设置	392
第二节 清代四川的土司和改土归流	429
第三节 清代四川的民族	537
后 记	676

第一章

旧石器、新石器时代四川的原始居民

第一节

四川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和原始居民

四川大地上，旧石器时代早期已有人类居住。1986年，巫山县（今属重庆直辖市）大庙镇龙坪村龙骨坡发掘出人类化石带，包括第四前臼齿和第一臼齿的左下颌骨1段、上右内侧门齿1枚、乳门齿2枚、恒门齿1枚，石器2件。1997年，龙骨坡遗址又发现大量旧石器。这些旧石器有人工打击痕迹，是古人类使用的工具，证实“巫山人”已具有人类特征。其石制品在190万年前地层发现，人类下颌骨化石约距今204万年前。“巫山人”是四川发现最早的直立人，铲形上门齿是黄种人特征之一。证明旧石器时代早期四川已有人类居住。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化石、遗址和石器在四川许多地方被发现，发掘情况如下：

1. 四川中部资阳县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化石、遗址和石器

1951年，在资阳黄鳊溪发现一老年妇人头骨化石，颅顶完整，颅底大部缺失，有硬腭1块、骨锥1个，其头骨上矢状脊是黄种人特征。1974年，根据原地乌木测定距今六七千年。贾兰坡先生认为，资阳人距今数万年至10万年。资阳人化石说明旧石器时代晚期四川境内居民是黄种人。1973年，在资阳同心公社鲤鱼桥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打制石器、石片及石核，年代距今 $25\ 100 \pm 400$ 年。石器有尖状器、刮削器、砍砸器和雕刻器等，以尖状器为主。尖状器是割猎物和采集植物块根的工具，表明当时是狩猎采集经济。^① 1980年在资阳九曲河公路桥基下发现100多件打制石器，有砍砸

^① 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349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段渝、邹一清著：《古蜀文明——璀璨的四川古代文明》，23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资阳等县石器时代文化》，载《考古》，1983（6）。

器、刮削器、尖状器，石核石片相当原始，年代不晚于距今34 000年。

2. 四川东部巫山县、铜梁县、重庆市、黔江县^①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化石、遗址和石器

1999年，在巫山县河梁区一溶洞发现人类顶骨化石1件、石制品40余件和人类用火灰烬遗迹，年代距今15 000年。

1976年在铜梁县城西1公里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出土300多件石器，打制刮削器120件、尖状器33件、砍砸器73件、石锤5件、石核和石片110件。其中端刃砍砸器较多，小型石器少，年代在距今5万—1万年前。铜梁石器与资阳黄鳊溪石器属同一类型。1983—1984年，在重庆九龙坡区马王场发现旧石器时代石器219件，其中砍砸器171件、刮削器43件，还有尖状器、石锤、石钻等，与铜梁旧石器有相似处，但其砍砸器更原始。^②

1979年，在黔江县正谊乡茶花村红土湾山洞发掘出1件打磨石斧。1985年在红土湾老屋基洞发现打制石器800多件，有石片、石核、刮削器、尖状器等器形，年代约属更新世中时期。

3. 四川北部北川县、万源市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化石和石器

1989年，在北川县烟云洞发现1块晚期智人门齿化石，年代距今20 000年前。2009年，万源市大竹镇头道桥溶洞发现一批石器，动物骨骼化石上有人为砍切痕迹，石器年代在距今10万—5万年前。

4. 四川南部筠连县、古蔺县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化石

1980年，筠连县镇州拱猪洞发现1枚人类右上第一臼齿化石，距今数万年。1993年，古蔺县一洞穴内发现古人类牙齿化石10颗和长约2厘米的牙床化石，距今10万—1万年。

5. 四川西南部汉源县、攀枝花市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

汉源富林镇遗址于1960年被发现，1972年开始发掘。出土石器材料5 000多件，小石器、小石片和小石核占绝对优势。刮削器、尖状器是工具主体，刮削器形制较多，端刮器和三棱形尖刃尖状器等加工较精致。富林石器与山西朔县峙峪、河南安阳小南海等遗址情况相仿。^③反映出富林石器与北方小石器关系密切。富林遗址距今约20 000年，其居民以狩猎和采集为主。

攀枝花市民政乡巴关河村回龙洞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年代距今约18 000—12 000年，出土打击石片、砾石器、小石器、细石器348件，骨器14件，牙化石106件；另见火塘、灰坑等遗迹。其中骨器有镞、刮削器、针、锥；石器有砍砸器、

① 今为重庆市黔江区，以下统称“黔江县”。

② 蒙默等著：《四川古代史稿》，3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重庆市博物馆：《略谈重庆文物考古的新收获》，载《四川文物》，1984（4）；赵殿增：《四川十年考古收获》，载《四川文物》，1989（5）。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20、22、26、27页，北京，方志出版社，2007。

刮削器、尖状器、穿孔器、盘状器、雕刻器、石锤、石凿、石镞、石刀、钻孔器、锯、砧等，刮削器、砍砸器和石核数量居石器之冠。在回龙洞遗址的打制石器中，南、北方石器特征、工艺技术都有所显示，形制趋于小型化。石制品器形、制作技术、风貌与广西白莲洞、广东西樵山、贵州猫猫洞，以及山西下川、峙峪、薛关，陕西沙苑等遗址有不少相似处。

以上考古发现反映出旧石器时代晚期四川境内原始居民文化呈现几种类型：铜梁、重庆九龙坡石器与资阳黄鳊溪、鲤鱼桥遗址代表四川腹地居民文化；汉源富林遗址显示北方石器文化向四川西部传播发展，代表四川西部原始居民文化；攀枝花回龙洞遗址是北方石器文化与南方石器文化交汇处，代表四川西南边缘原始居民文化；筠连人、古蔺人文化情况不清，代表川南边缘类型；黔江旧石器代表四川东部边缘文化。此时期四川原始居民已显示出群体间差异。

第二节

四川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和原始居民

一、四川各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和采集点

四川新石器时代遗址有 200 多处，分布在全省大部分地方，其中成都平原遗址较多。这些遗址反映了当时四川多数地方有原始居民生息、繁衍；成都平原适宜人类居住，原始居民聚落较多。以下择要对这些遗址和采集点进行介绍，并指出其文化类型、相互关系。

1. 四川北部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和采集点

(1) 广元市、绵阳市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广元市中子铺细石器遗址，于 1990、1991 年出土和采集了 1 万多件细石器标本，出土的夹砂绳纹红褐陶片火候很低、特征原始，已属新石器时代。细石器器形有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等。该地还出土少量磨制石器、陶片，并出土石工具有斧、铤、凿、刀、磨石和磨盘、磨棒等，陶器有罐、碗、三小足器、圈足器等，平底器多。中子铺遗存早期距今 7 000—6 000 年，晚期距今 6 000—5 500 年。

广元市张家坡遗址，于 1989 年掘出砾石石器百余件，有斧、铤、凿及端刃刀、矛、杵、小砍器等，多较小巧。陶器以平底器为主，罐、盆较多，个别为圈足器（有豆）。张家坡遗址与中子铺有些联系，但差别大，年代距今 6 000—5 500 年。

广元市邓家坪遗址，于 1990 年发掘，出土的陶器有深腹罐、鼓腹罐、钵、碗、器盖等。陶片和张家坡一样有许多裙边口沿；石器趋小型化，器形有斧、铤、凿、铲、刀、镞及个别细石器标本。邓家坪遗址和张家坡、边堆山遗址有一些联系，年代距今

5 500—5 000年。

绵阳市边堆山遗址，于1989年试掘，出土的石器呈小型化，以磨制石器为主，其次较多用打制石器，有少量细石器。石器有大量长方形或梯形斧，也有长条形、柱形斧或石楔，铤和凿较多，还有铲、刀、矛、镞、石球（弹丸）、砺石磨石等。打制的有盘状器、砍器、刮削器等。陶器有罐、缸、壶、盆、盘、碗等平底器，圈足器有豆。边堆山遗存和广元各遗址有程度不同的联系，也有自身特性，年代距今5 000—4 500年。^①边堆山出土的狩猎用的石球、兽齿和磨制骨器，房屋基址和大量红烧土，房屋是木筋泥墙，烧土上草茎痕和圆形孔，表明四川盆地原始居民，过着定居农耕兼狩猎生活。

广元市东坝鲁家坟遗址，出土陶器与边堆山、张家坡、邓家坪雷同或相近，时代也接近。青川县沙洲区江边村老田坝新石器时代遗址，与张家坡、邓家坪时代相近。旺苍县张华镇宋水村五社新石器时代遗址，距今4 000年左右，出土有磨制石刀、石斧、石铤等。

(2) 大巴山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和采集点

四川北部大巴山腹心和边缘，20世纪80年代发现17处新石器时代末期遗址和采集点。南江阳八台遗址出土有木炭核、红烧土、石凿、石斧、石锄、石镰等，有夹砂灰陶片5块，器物有盆、碗等。渠县共和乡清河坝、土溪上游、大义乡锣尔顶等地，采集到陶网坠4件和石铤、石矛、红烧土、石斧、砍砸器等数十件。万源井溪乡、竹裕、白羊、红鱼泉等处采集到一批磨制石斧、打制石凿、刮削器、石杵。1989年，通江春在乡擂鼓寨遗址出土石器、陶器1万多件，可辨器物为圆腰圜底罐，其中磨制小型锋刃石斧，夹砂和泥质平底器、圈足器及少量细石器和双肩石斧，显示出独特文化面貌。巴中酒店乡月亮岩遗址，1976年以来采集和出土磨制石斧4件、砍砸器2件、石镰和夹砂、泥质陶片200多件。巴中永宁、柳岗、渔溪等处发现石斧、穿孔石刀、石铤等。这些遗址文化面貌大致相同。巴中月亮岩与通江擂鼓寨遗址属同一文化系统。擂鼓寨、月亮岩等遗址和广元中子铺、产张家坡、鲁家坟、邓家坪、绵阳边堆山、青川老田坝等遗址器物同一类型，与忠县谿井沟遗址大致相同，与嘉陵江中下游南充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基本一致。石器斧、锄、砍砸器、刮削器、石球，表明这些土著居民以农耕为主，狩猎为辅。渠县、宣汉的陶网坠、砍砸器则与渔猎有关。^②

(3) 嘉陵江中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和采集点

1979年阆中兰家坝遗址等处采集到陶器、石器数十件。1989年阆中坪上遗址发现石器、陶器，并发现灰坑、火塘各2处。阆中兰家坝、坪上遗址，南充报本寺、南部潏博寺和江津王爷庙、合川沙梁子、巴县甘井沟、忠县中坝、谿井沟及重庆市区、长寿、江北等处遗址属同一类型，出土的石器打制器多，磨制器少，刃精细，有铲、斧、杵、铤等。出土的陶器有罐、瓮、缸、盆、钵、碗、豆、杯、盘等，以小腹内收泥质褐陶及

^① 王仁湘、叶茂林：《四川盆地北缘新石器时代考古新收获》，见李绍明、林向、赵殿增主编：《三星堆与巴蜀文化》，257~2614页，成都，巴蜀书社，1993。

^② 马幸辛：《川东北考古文化分期刍论》、《大巴山脉与川北史前文化的探讨》，载《四川文物》1989（6）、1993（5）；雷雨、陈德安：《巴中月亮岩和通江擂鼓寨遗址调查简报》，载《四川文物》1991（6）。

内褐外黑小平底器、尖底器、圜底器、细泥内红外黑小口高领瓮、侈口平底罐和宽沿盆为特色。这一类型距今4 000年左右，受黄河流域原始文化影响较大，与川西平原原始文化关系密切，广汉三星堆、新繁水观音等遗址出土的尖底杯、小平底罐、圈足豆在这一类型地区均有发现。石斧、石锄、石镰、砍砸器和大量刀、矛、网坠、纺轮等石、陶工具，显示这一类型地区原始居民以锄耕农业为主，渔猎和纺织已成为重要生产活动。^①

2009年南充李渡镇羊口村羊口街发现距今5 000年的新石器遗址。2009年广安市及所属县区发现新石器时期遗址24处。

2. 四川东部、东南部（包括今重庆直辖市）新石器时代遗址和采集点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在黔江县正阳乡茅竹岭挖出1件磨制石器刮削器。奉节鱼复浦遗址发现石器、陶片，年代距今7 500年左右。巫山县刘家坝遗址采集到相当于湖北城背溪文化时期陶片，距今年代约7 000年。

奉节县老关庙遗址下层文化属新石器时代早期，于1993—1995年发掘。出土的石器磨制精细，主要有斧和铤；纺轮形体较小。陶器多直口或敞口，以平底或尖底为主，圈足器极少；主要器形为夹砂罐和尖底缸，还有壶、盆、钵及少量碗、豆和器盖。奉节县杜家坪、李家坝、老油坊，云阳县东阳，忠县中坝，丰都凤凰嘴、石地坝、麻柳嘴、玉溪等遗址也发现老关庙下层文化遗物。老关庙下层文化距今7 875年。老关庙红褐色粗砂类陶罐的质和色、细砂质磨光红褐色盆、钵类残片、少量戳印纹均与下文中大溪文化同类器物相似或相同。两种文化应存在一定亲缘联系。^②

大溪文化分布于湖北省西南、湖南澧县和重庆市巫山、奉节连接地带，距今6 400—5 300年。巫山大溪遗址发现于1958年，1959、1975年清理墓葬207座，出土大量石器、陶器、骨器和玉器，1994年发掘墓葬3座。大溪遗址石器有斧、铤、凿、锄、刀、矛、镞、纺轮、盘形器、人面形玩具等。陶器以红陶为主，灰陶、黑陶次之，彩陶较少；器形有釜、鼎、豆、簋、碗、碟、罐、瓶、空心球等。骨器有锥、针、凿、刀、矛等。玉器有璧、璜、环、玦、耳饰等，制作较精致。还有蚌镰、蚌环珠、象牙圈、海螺等。葬式复杂，直肢和屈肢各约一半，以10多种不同形状屈肢葬最具特色。

大溪文化是在当地发展起来的，其出土黑陶和黄河中下游龙山文化有一定渊源关系，彩陶和北方仰韶文化有相似处。石锄、蚌镰和彩陶碗上谷穗纹饰，反映当时农业有相当发展；兽骨、鱼骨、鱼钩和用鱼、狗殉葬，表明渔、猎占重要地位。大溪遗址墓葬普遍用鱼甚至整条大鱼随葬。盛行单人墓，有母子合葬墓，小孩单人墓多靠近女性墓。早期墓葬随葬生产工具为主，晚期墓葬随葬陶制生活器皿为主。随葬品有的多达50余件，有的空无一物，反映出社会贫富不均的分化现象，大溪遗址晚期处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时期。^③

忠县管井沟遗址于1959、1975年发掘，出土石器、陶器、人骨及兽骨等。石器有

① 马幸辛：《大巴山脉与川北史前文化的探讨》，载《四川文物》，1993（5）。

② 王鲁茂：《川东史前文化初探》，载《四川文物》，1997（3）。

③ 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349、350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杨华、丁建华：《巫山大溪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载《四川文物》，2000（1）。

斧、镑、凿、锄，一般为打制后粗磨而成。陶器有碗、罐、绳纹釜、角状尖底杯，多数为红陶，火候较高，以角状尖底杯为特色。睿井沟遗址可能晚于大溪遗址。^①忠县中坝遗址，1997年以来发掘，中坝遗址一期是新石器晚期遗存，距今5 000—4 000年，主要有灰坑、窖藏、墓葬、房址等，遗物有陶器、石器、骨器。陶器有尖底杯、环底罐、小平底罐、高柄豆、敛口瓮等。这里是三峡库区经济活动中心。^②

大溪文化的发展为湖北屈家岭文化。忠县哨棚嘴遗址发现的屈家岭文化遗物，陶器以平底器、圈足器为主，亦有尖底器。主要有敞口深腹罐、高领罐、花边罐、折腹深沿罐、折沿盘、敛口罐等，亦有高圈足器。哨棚嘴遗址文化特征与鄂西及川西平原古文化有极大区别，极具地方特色。哨棚嘴遗址年代可能距今4 600~3 800年左右。忠县中坝遗址早期遗存是哨棚嘴文化典型代表。从夏商时期开始，具有三星堆文化特征的新文化因素强烈表现出来，并在一定程度上占据主导地位，这与三星堆文化顺江向东辐射有关。^③

1980年，重庆市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26处，采集点14处。江津王爷庙遗址采集出土石器670余件和不少陶片。石器有石球、耜、锄、镰、刀、斧、镑、凿、矛、镞、刃器、砍砸器、尖渔网坠等，陶器有碗、钵、豆、罐、釜、尖底瓶、纺轮、陶珠等，反映出距今四五千年前重庆地区原始居民过着农耕和渔猎生活，已出现原始纺织。陶器器形和纹饰与黄河流域、长江中下游新石器文化有一定联系，又有显著地方特色。^④

1985年，在巴县新房村及薛家溪沟等新石器时期遗址采集到石斧、石镑、石凿、石钺、网坠、砍砸器等和绳纹陶片近40件。1986、1987年在合川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地点18个，发现合川沙梁子、巴县干溪沟等遗址。1987年在巫山大宁河上游发现有原始文化堆积层的遗址11处，文化遗物采集点2处。刘家坝等4处遗址，采集出土大量陶片、火烧土碎屑和石块。

2007年至2008年1月，在重庆市南岸区广阳坝墓群发掘出大量陶片、石器，清理6座土坑墓，出土大量打制砍砸器、刮削器、尖状物、雕刻器、锄等石器工具。发掘出2处窑址和1座侧身屈肢葬小型土坑墓，屈肢葬遗骸头部朝北，是典型三峡地区巴人葬俗。该窑址很可能建于新石器时代，屈肢葬具体年代还需鉴定。^⑤

3. 四川西北部新石器时代遗址和采集点、文化点

1985年，在甘孜藏族自治州炉霍县宜绒、戈巴龙村发现遗址各1处，在色得龙、宜绒、若海、吾都、固衣、戈巴龙和热巴7处采集石器标本32件。其中石核石器23件，以砍砸器为主，石斧3件，有2件为有肩石斧，还有盘状器、凿形器、锤、矛头；石片石器9件，有砍砸器、刮削器。炉霍石器既有北方因素如细石器，又有南方因素如砾石砍砸器。^⑥

① 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349、350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② 刘蓉：《三峡库区中坝遗址考古发掘鸣金》，载《四川日报》2002年12月17日第4版。

③ 胡昌钰、赵殿增：《三峡考古回顾与探讨》，载《四川文物》，2003（3）。

④ 重庆市博物馆：《略谈重庆文物考古的新收获》，载《四川文物》，1984（4）。

⑤ 《重庆挖出原始人墓葬》，载《华西都市报》2008年1月25日第07版。

⑥ 李森、李海鹰：《炉霍的打制石器》，载《雅砻江上游考察报告》，103~107页，1985年7月印。

岷江上游自 20 世纪 20 年代初在汶川县姜维城发现彩陶以来至 1995 年,在松潘、汶川、茂县、理县等县发现 30 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及石器采集点。姜维城类型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泥质红陶次之,其中甘青马家窑文化彩陶占一定比例。陶器皆平底器,有罐、钵、瓶、碗等。石器有斧、镑、凿、锄等,形体较小,属农业经济。年代约为公元前 3 000—前 2 900 年。理县薛城箭山寨类型陶器纹饰与姜维城类型陶器相近,有极少量马家窑文化彩陶。陶器以平底器为主,有碗、钵、盆、瓶、罐、杯等。石器有斧、镑、凿、刀等,形体较小,属定居农业兼狩猎经济。年代上限略晚于姜维城,下限相当于中原的夏代。汶川县龙骨乡阿尔村类型,出土的陶器不见彩陶,出土有略经磨制的斧、镑类石器,年代早于姜维城。^①

2000 年,在岷江上游发现了茂县营盘山、松潘县东裕村、汶川县高坎、理县猛古村、黑水县官纳若等 54 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以及茂县壳壳寨、汶川县布兰、理县四南大村、黑水县泽盖村等 29 处新石器遗物采集点。出土和采集到的陶片纹饰以绳纹、附加堆纹、素面磨光、花边口沿装饰、素面、瓦棱纹、彩陶等为主,器形包括罐、钵、碗、盆、高领罐、瓶、瓮等,多为平底器,有部分圈足器。磨制石器有斧、镑、凿、弯刀形双穿孔刀、纺轮等,打制石器有砍砸器、杵、切割器等。

茂县凤仪镇营盘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为大型中心聚落遗址。2000、2002、2003 年发掘营盘山遗址房屋基址 18 座、人祭坑 8 座、灰坑 120 余个、窑址 4 座、灶坑 11 座等。房址遗迹包括柱洞、基槽、灶坑及贮火罐等,房内红烧土块上有棍棒插抹痕迹及拌草遗存,可推测采用木骨泥墙形式。大型广场类较平整硬土面出土陶器、玉器、石器、细石器、骨器、蚌器等上万件。硬土面下发现 4 座人祭坑,表明这里应是举行祭祀等重大活动场所。陶器纹饰包括粗细绳纹、附加堆纹、素面磨光、彩陶、绳纹花边口沿装饰、素面、弦纹、瓦棱纹、划纹、复合纹饰、戳印纹、捏塑与刻画相结合的人面像等。陶器以平底和小平底器为主,有少量矮圈足器,包括侈口罐、深腹罐、碗、钵、高领罐、盆、瓮、带嘴锅、缸、宽折沿器、瓶、纺轮、陶球、穿孔器等。彩陶器盆、钵、罐、瓶等为黑彩绘制。打制石器包括大型石片切割器、砍砸器、杵、石球(弹丸)、网坠等。磨制石器包括斧、镑、长方形穿孔石刀、凿、砺石、穿孔石片等。玉器包括环镯形器等装饰品、璧形器、仿工具及武器类的斧、镑、凿、穿孔刀、箭镞等。细石器包括大量石叶、石核,质地以燧石及水晶为主。骨器包括簪、锥、针、削、箭镞等。

上述发现表明营盘山先民以定居农耕为主,酒具类陶器、贮藏粮食等的袋状灰坑,表明营盘山先民的农产品数量较丰富。网坠、石球、箭镞及剥离兽皮的细石器,反映他们进行狩猎和畜牧并以捕捞为辅助。

营盘山灰坑出土涂抹红色颜料石块,一件陶矮圈足器内壁也有红色颜料,红色颜料以朱砂为主,这反映出营盘山先民有涂红习俗。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玉器、石雕像涂红色颜料,也许是营盘山先民朱砂涂红的影响。

营盘山陶质雕塑人面像,与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彩陶瓶上陶塑人像较相似,表明营盘山文化受甘青文化传播影响。

^① 徐学书:《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初步研究》,载《考古》,1995(5)。

广场类遗迹下的人骨坑，其中3座各有1具较完整人骨架，是奠基性人祭坑。另一座有1件人头，可能与猎头习俗有关。房屋密集区附近也有4座同类性质人祭坑。

营盘山遗址距今约5 500—5 000年，甘青马家窑类型文化对营盘山文化的影响仍占相当重要地位。但同时以夹砂褐陶侈口花边罐、喇叭口长颈陶罐形器、矮圈足陶器及燧石细石器等为代表的本土特色文化因素逐步突显。

2002年发掘茂县凤仪镇平头村波西遗址，出土磨制石斧、打制石网坠、磨制石环等。陶器有彩陶钵、细泥红陶直口尖唇钵、双唇小口瓶、侈口罐、溜肩罐、高领罐、碗等。细泥红陶弧边三角形彩陶钵、直口尖唇钵、双唇小口瓶与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一期文化同类器物特征相近，未见马家窑类型彩陶，这表明波西遗址外来文化因素占较明显的主体优势，年代应早于营盘山遗址。

茂县凤仪镇水西村沙乌都遗址，出土及采集陶片包括夹砂灰陶、夹砂褐陶和泥质磨光黑皮陶等，不见营盘山遗址的彩陶和细泥红褐陶；器型有侈口罐、溜肩罐、喇叭口长颈壶形器、钵、带流器等。沙乌都夹砂灰陶绳纹及锯齿状花边口沿侈口罐、泥质磨光陶喇叭口长颈壶形、沿面施绳纹的夹砂褐陶罐等遗物与成都平原宝墩文化同类器物特征相同，二者存在较密切联系。沙乌都遗址距今4 500年左右，本土文化因素已胜于外来文化因素，占据优势地位。^①

马尔康县沙尔宗乡哈休新石器时代遗址距今5 500—5 000年，2006年出土打制石器、磨制石器、细石器、陶器、玉器、骨器等上千件，其中有陶塑人面像、涂朱双孔石钺、穿孔凹背玉刀及四川最完整的陶小口尖底瓶。一些石器表面、个别陶片上涂抹红色颜料。骨角器包括锥、笄、镞等。出土大量鹿、猪、牛、狗、马、獐等动物骨骼，发现粟等已碳化农作物种子。这些发现说明哈休先民以定居农耕为主，狩猎、采集为辅。哈休遗址包括土著文化、中原仰韶文化和甘青马家窑文化，和三星堆、金沙遗址有着传承关系。^②

陶塑人面像、涂红石器、陶器，在营盘山遗址也有出土。反映了哈休遗址、营盘山遗址文化类型相近。哈休遗址、营盘山遗址反映了仰韶文化、甘青文化与四川西北土著文化的融合，反映了甘青等地迁来的人群与土著人群的融合。

4. 四川中部偏南大渡河中游、青衣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汉源县大树狮子山遗址出土的陶器以夹砂红陶为主，胎厚，火候高，与川西南礼州文化及川西北新石器文化类似，年代距今4 000—3 500年。

汉源县、石棉县还发现多处新石器文化遗址和采集点，汉源麻家山、大瑶、麦坪、青冈、海螺、桃坪、富林镇背后山、小堡、青富、中心，石棉丰乐、宰羊、永和等处，发现大量石器和陶片，少量玉器、骨器和完整的陶器，石器有斧、镑、凿、杵、刀、箭镞、尖状器、刮削器、砍砸器等，以石斧为多见。斧、镑、凿、刀、箭镞均磨制。尖状器、刮削器为小石器，燧石制成，类似富林文化。有少数精美磨制玉斧、玉凿，应为祭品或礼品。

① 陈剑：《营盘山遗址再现“藏彝走廊”5 000年前的区域中心——岷江上游史前考古的新进展》，见石硕主编：《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301~314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

② 郭庄：《古蜀文化寻根 揭开哈休面纱》，载《成都商报》2006年4月30日04版。

骨器仅骨锥1种。陶器多见平底器、圜底器、尖底器，有少量锥形足器。有平底罐、尖底罐、尖底杯、双耳罐、豆形器以及钵、盆、釜、碗、网坠等。这些遗址和采集点的文化内涵与狮子山有许多相似，也有不同。麻家山等遗址略晚于狮子山遗址。^①

2000年，汉源县大渡河南岸姜家屋脊距今5000—4000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大量石器、陶片、灰烬、烧红土块等，有打磨石斧、穿孔石刀、石网坠。石器均磨制。陶片泥质为主，制陶技术已很成熟。^②

2004年以来两年间，发掘汉源县大树镇麦坪、金钟山、摆渔村新石器时代遗址10余处。汉源县大地头遗址，首次发现成排石房基址，共7座13间，成3排，每排3~6个小开间，每间面积大致相同。墙体用块石垒砌，屋内有石块环绕成的圆形火塘，居住面用碎石拌泥铺成。这在四川属首次发现。摆渔村遗址发现11个新石器时代灰坑，出土物包括陶器、石器和骨器，大量动物骨骼，部分有明显烧烤痕迹。^③ 墙体用块石垒砌，应是后世邛笼的始源。

汉源县麦坪遗址年代距今约5000—4500年，2006—2007年发掘麦坪遗址房址34座、灰坑106个、墓葬8座。房址一类是干栏式建筑，另一类为木骨泥墙式建筑；部分房基有垒筑墙体。室内多有圆形灶，多座房子北部有门道，许多房址门向一致，有明显组群关系。其中一处房址有3个房间，呈单元组合结构，是现代庭院式建筑雏形。遗址应是较大的人群聚落地。5座长方形土坑墓，多随葬陶罐。3座石棺葬，用修整光滑的石板围砌成，其开口地层属新石器时代晚期早段，是目前四川发现的最早石棺葬。出土遗物主要为石器和陶器。磨制石器以锛、刀、凿、网坠数量最多，另有钺、双端刃器、锥、饼、球、斧、研磨器、饰品等，农业已较发达。^④

20世纪50年代，雅安县沙溪村西面斗胆村采集到一批有肩石器。1985、1986年雅安市河北乡沙溪村遗址，出土的陶器以小平底器为主，尖底器次之，圜足器、大平底器极少；器类有罐、杯、盏、豆、盆、钵、缸、器盖、器座和纺轮等。石器187件，绝大多数为打制。打制石器有细石器17件；石片石器154件，其中有肩石铲11件、有肩石斧63件，另有切割器、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盘状器、镞形器等；石核石器11件。磨制石器5件，为斧、镞形器。沙溪遗址下文化层晚期年代距今 3100 ± 70 年。有肩石器，沙溪遗址下文化层早期种类较少，双肩不显，制作较粗糙；晚期种类丰富、形制多样，宽肩，制作较规整、精细。有肩石器在青衣江流域雅安、芦山、天全、荃经、洪雅、夹江、峨眉等地大量出现，基本相同，是青衣江流域原始文化地方特征，和广东有肩石器无渊源关系。沙溪遗址下文化层所出与早期蜀文化陶器共存的有肩石器与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巴蜀文化某些铜兵器及铜工具有某种内在联系。^⑤ 有肩石器由早期双肩

① 王瑞琼：《汉源县瀑布沟水库淹没区文物古迹调查简况》，载《四川文物》，1990（3）。

② 李彬林、冯俊锋：《汉源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载《四川日报》2000年8月29日第5版。

③ 蔡宇、吕佳：《大渡河挖出新石器，咋像三星堆的？》，载《华西都市报》2007年2月27日第1版。

④ 丁伟：《汉源麦坪入选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载《华西都市报》2008年1月23日16版。

⑤ 四川省文管会、四川省文物考古所、雅安地区文管所：《雅安沙溪遗址发掘及调查报告》，载《南方民族考古》，293~335页，1990（3）。

不显到晚期双肩明显，反映出本地土著文化石器制作技术的发展。1985年荣经县同心村发现有肩石锄69件、石片石器刮削器、盘状砍砸器40余件。这种以有肩石锄为典型特征的早蜀文化类型，定名为“青衣江—斗胆村类型”。^①

5. 四川西南部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四川西南部新石器时代遗址以西昌礼州遗址为代表。

1974—1976年发掘礼州遗址，包括墓葬21座、窑址1座，出土石器100余件，陶器300余件。石器多磨制，砍砸器为打制。器形有石刀、砍砸器、斧、镑、凿、锥、刮削器、纺轮、网坠、石璧、砺石、磨石、石臼、石球等，以半月形石刀、砍砸器为主。双孔半月形石刀，多弧刃直背，穿孔在背部，少数平刃弧背。陶器平底器为主，有少量圈足器。有杯、碟、盘、盏、钵、碗、坛、盆、罐、小口瓶、壶、豆、桶形器等，以桶形器、双联罐、管状带流壶、喇叭状小口瓶、大口深腹罐最具特色。有相当一部分双耳罐、单耳罐，有一些带角状把手的器物。墓葬为长条形竖穴土坑墓，坑两头各放一组陶器，尸骨无存，葬式不明，似为单人葬。礼州遗址年代距今3500~3000年。西昌安宁河流域还发现14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和18个石器采集点，石器、陶器与礼州遗址相似。礼州遗址与云南元谋大墩子遗址有很多相似，合称“大墩子——礼州文化”。礼州陶器多平底、小圈足，不见三足器，多带耳器是我国西北原始文化特征。^②

盐边县鳊鱼公社鳊鱼场和健康公社堰口大队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石器遗物，与大墩子和安宁河流域石器大体相同。

1987年发现盐边县惠民乡红星遗址、攀枝花市仁和区新生乡下湾遗址、米易县挂榜乡、丙谷乡袁家堡遗址，年代距今4000—3000年，文化面貌同大墩子相似，受西北原始文化影响颇深。仁和区平江乡席草坪洞穴出土少量质地坚硬的印纹陶片，系受东南原始文化影响产物，年代可能偏早。反映了东南和西北原始文化共同影响攀枝花的复杂关系。^③

6. 川南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和采集点

1981、1987年发现宜宾县真溪乡丁发村大田队、龙潭乡岷江村合江队邓头溪、黄伞乡黄龙村象鼻子岩、黄伞乡拥护村鸡儿荡、高场乡太平队、青云乡大明村河口、恩波乡临江村马路口、喜捷乡群众村山头小队8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物采集点，采集到的石器多打制，也有磨制，以锄、铲、砍砸器为主，还有石斧、石凿、有肩石铲、网坠、刮削器、尖状器等，发现有石片、石核。陶器有瓮、罐等。这些采集点与青衣江流域古文化可能有一定关系。高县、筠连等处也发现一些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④

2007年，屏山县楼东乡田坝村叫化岩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有夹砂灰黑陶片、花边

① 李炳中、何伟：《荣经同心村发现石器》，载《四川文物》，1994（1）。

② 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350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赵殿增：《试论西昌礼州遗址及其与周围文化的关系》，载《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1981（1）。

③ 马云喜：《攀枝花先秦考古发现与研究》，载《攀枝花市文物考古、历史、民族研究资料选集》第三集，4、5页，1994年12月铅印本。

④ 赵殿增：《四川十年考古收获》，载《四川文物》，1989（5）；魏宁、廖明、赵川荣、孙智彬：《岷江下游宜宾河段再次发现新石器时代遗物》，载《四川文物》，1989（3）。

口沿罐等，还有一个磨制石斧，直腰、圆弧刃。遗址年代距今5 000~4 000年。^①

7. 成都平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2009年，什邡市回澜镇玉皇村桂圆桥距今5 000年前的遗址出土上千块陶器残片，2件石铤、2件石斧、1件石砺和数个纺轮，具有三星堆文明重要特点，年代早于三星堆一期和宝墩文化，证明了三星堆文明从龙门山走向成都平原的考古界猜测。^②

1995、1996年，成都平原新津、都江堰、温江、郫县、崇州发现距今四五千年古城址。

新津县龙马乡宝墩古城址，面积60万平方米，城墙用坡状堆筑法夯筑。出土泥质陶较多，多以泥条盘筑加慢轮修整制作。夹砂陶多夹细砂，以夹砂灰陶为主，镂孔多施于圈足。夹砂陶器多平底器，外折沿纹唇花边口罐最多。圈足器以尊形器和罐形器为代表。有一些盘口形器。泥质陶以灰陶和灰黄陶最多，陶质稍软的器表多施黑色陶衣，以戳印纹和附加泥条戳印坑点带及篦划水波纹最具特色。器形以喇叭口高颈罐、宽折沿深腹罐为主，有圈足浅盘形豆和带耳器，有陶纺轮。石器以小型为主，有斧、铤、凿，均磨制。发现房子、灰坑等遗迹。

都江堰市青城乡芒城古城址，距今四五千年。面积约12万平方米，内外两层城墙像“回”字。发现灰沟1条、数以万计的陶片、10多件石器。陶器手制加慢轮修整为主。泥质陶比例较大，代表性器物有喇叭口高颈、宽折沿盆和宽折沿罐、器盖及少量带柄圈足豆。夹砂陶以外折沿纹唇花边口罐和圈足器为代表，有一定数量盘口形器。石器磨制，有斧、铤、凿。清理出1处房舍和水沟遗迹。房舍用木骨泥墙。

温江县万春乡鱼鳧村古城址年代距今4 200年左右，清理灰坑72个，灰沟2条，出土大量陶器石器。陶器以夹砂褐陶为主。夹砂陶纹唇花边罐最多，小平底假圈足敞口罐、圈足器占一定比例。泥质陶以喇叭口高颈罐、宽折沿罐为代表，有少量盘口形器和带耳器，其中圈足器较独特。石器以小型为主，多磨制，以铤为主，有少量斧、凿和穿孔器。1999年发现古城墙为竹骨结构，外层有5层夯土；内层竹骨不存，但鹅卵石堆依旧。出土高颈罐、花边罐等陶器及石斧、石铤、石矛、石凿等石器。

郫县三道堰镇的郫县古城遗址，清理灰坑9个，房址2座。房址方形，挖基槽，作木骨泥墙，发现木骨印痕的火烧土块，推测木骨泥墙经火烘烤。主要出土陶器和石器。下层夹砂陶和泥质陶各半，上层夹砂陶为主，泥质陶较少。夹砂陶以外折沿纹唇花边罐、圈足器为主，有少量盘口形器。泥质陶以喇叭口高颈罐、宽折沿深腹罐为常见，少量带耳器，还有陶纺轮。石器磨制，有斧、铤、凿等。

^① 蔡宇：《宜宾向家坝库区考古发现“地下历史博物馆”》，载《华西都市报》2007年12月20日05版。

^② 记者蔡宇、摄影陈羽啸、实习生涂岱彬：《从大山走向平原，三星堆人什邡留“脚印”》，载《华西都市报》2009年7月11日02版。